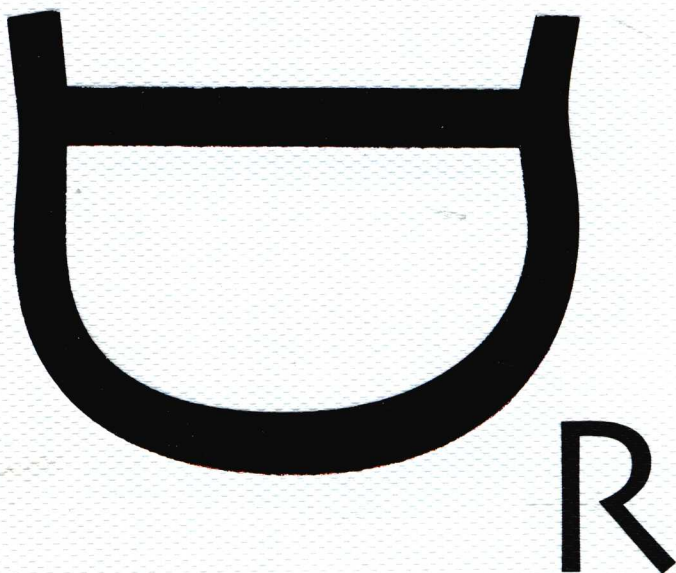




Siegfried Kraacauer

侦探小说

哲学论文

Der Detektiv-Roman

Ein philosophischer Traktat

[德]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藏书
侦探小说

哲学论文

Siegfried Kracauer

[德]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Der Detektiv-Roman

Ein philosophischer Trakta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62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侦探小说：哲学论文 / (德)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 著；
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7

(雅努斯思想文库)

ISBN 978-7-301-28353-0

I. ① 侦… II. ① 西… ② 黎… III. ① 侦探小说—小说研究—德国—现代
IV. ① I516.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5378号

DER DETEKTIV-ROMAN: Ein philosophischer Trakta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1.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Introduction © 2015 by Inka Mülder-Bach

- | | |
|-------|--|
| 书 名 | 侦探小说：哲学论文
ZHENTAN XIAOSHUO: ZHEXUE LUNWEN |
| 著作责任者 | [德]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
| 责任编辑 | 邹震 周彬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353-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10 千字 |
|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001 《侦探小说》导读 / 因卡·米尔德-巴赫

019 引 言

023 领 域

049 心理学

059 酒店大堂

075 侦 探

093 警 察

109 罪 犯

119 转 化

133 过 程

171 结 局

179 索 引

195 译者的话

《侦探小说》导读

因卡·米尔德-巴赫*

通过对《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 1947) 和《电影的理论》(*Theory of Film*, 1960) 这两本成书于美国并原以英文写就的著作的翻译, 迄今为止,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中国首先以电影史学家和电影理论家著称。现在,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侦探小说》中译本则会带大家了解

* 因卡·米尔德-巴赫 (Inka Mülder-Bach), 德国慕尼黑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Fakultät für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en,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1985 年, 米尔德-巴赫教授以《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理论和文学之间的越境者》(*Siegfried Kracauer. Grenzgänge zwischen Theorie und Literatur*) 为题出版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本研究克拉考尔早期写作的专著是克拉考尔研究领域的拓荒力作; 其后, 米尔德-巴赫教授一直致力于克拉考尔作品的整理和研究, 她与人共同主持编辑的最新校勘版克拉考尔文集已在苏尔坎普出版社 (Suhrkamp) 陆续出版。(如无特别说明, 本书以“*”号标注的注释为中译注)

他写作的另一个时期和另一些面向。《侦探小说》写作于 1922 年至 1925 年，不过，除了其中一个章节，^[1] 本书在其作者有生之年没有被公开发表，它代表了克拉考尔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创作活动的一个特定阶段，在此期间，作为传奇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 的编辑，克拉考尔凭借其随笔、批评、专栏文章、小说和理论文章跃升至德国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行列。《侦探小说》是对他终其一生与现代大众文化诸现象进行论争的一份早期证明，同时见证了滋养这一论争的理论冲动。

自从天才侦探西·奥古斯特·杜宾 (C. Auguste Dupin) 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 1841) 中首次登场，侦探小说的类型在全欧

[1] 在本书手稿未予公开长达四十年后，才有一段节选面世，即 1963 年的选集《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 中的“酒店大堂”(“Hotelhalle”)章节，《大众装饰》的出版在德国开启了对魏玛时期作家克拉考尔的再发现。《侦探小说》的首次完整发表发生在克拉考尔去世之后：《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文集》(*Siegfried Kracauer: Schriften*)，第一卷，卡斯滕·维特 (Karsten Witte) 编辑，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71 年，第 103—204 页。校订和评注版见《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作品集》(*Siegfried Kracauer: Werke*)，因卡·米尔德-巴赫、因格里德·贝尔克 (Ingrid Belke) 主编。第一卷《社会学作为科学：侦探小说：雇员们》，因卡·米尔德-巴赫选编，米尔加姆·文策尔 (Mirjam Wenzel) 协助，苏尔坎普出版社，2006 年，第 103—209 页。

文学中的地位便扶摇直上。克拉考尔是最早对这一类型作品进行理论表述的人之一。然而，介绍类型历史、叙述其发展或者描述单个作品，这些在他看来全无意义。他的兴趣在于对一种审美形式进行历史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阐释。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受到格奥尔格·冯·卢卡奇（Georg von Lukács）《小说理论》（*Theorie des Romans*, 1920）的启发，克拉考尔在1922年曾详细讨论该书并评价它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侦探小说》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几乎同时完成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1928）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不过，本书的独特之处以及对克拉考尔而言具有突破意义的是，他让一种“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只是无关文学的粗制滥造”（107）*的文学类型获得了一番形而上学的释义，而且，反过来又以此方式在一种微不足道的文学现象上试验了各种形而上学的范畴。当卢卡奇将他对新时代的诊断表述为“被神弃绝的世界”（*gottverlassene Welt*）并在论及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正

* 米尔德-巴赫教授在本文中对《侦探小说》的引用皆出自《克拉考尔作品集》第一卷（因卡·米尔德-巴赫主编，苏尔坎普出版社，2006年），括号中所注明的为相应页码。由于行文有差异，译者在翻译本导读对《侦探小说》正文的引用时没有采用和中译本正文完全一致的译法。

典文本时说出新时代个人“先验的无家可归”（transzendente Obdachlosigkeit）的著名论断时，在克拉考尔这里，一跃成为现代之讽喻的正是柯南·道尔、吉尔伯特·凯斯·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和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的通俗故事。依据他所考察的主导论题，这些故事向“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执起一面变形镜”，这个社会可以在其中辨认出自己的“胡作非为”：“它们呈现的图像足叫人惊惧：它表明社会的一种状态，在其中，无所拘系的智性已经赢得了最终胜利，人与事仅止于外在的杂处并置让人感到惨白而缭乱，原因则是，这幅图像把被人为阻断的现实扭曲成了怪相。”（107）尽管合理性（Rationalität）和逻辑洞察力在爱伦·坡之后成为了侦探办案的构成特征，同时也在后来的类型理论中一再得到相应强调，但克拉考尔所说的“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无所拘系的智性”和“被人为阻断的现实”却有着特定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其早期作品的语境中展开，而关于侦探小说的研究即从这些作品发展而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克拉考尔同代其他知识分子的精神及政治的觉醒氛围，最初在克拉考尔的作品里鲜有踪迹。他没有感到身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是觉得来到了一个历

史性“瓦解过程”的终点，^[1] 他认为，在这个瓦解过程中，随着“一种捕捉总体实在之意义的消失”，^[2] “自我和世界之间的脐带”（186）被扯断，同时，存在（Sein）在孤立的主体中意义充实的总体性和事物的某种混乱的多样性都碎裂了。超越视域的丧失、传统联系的解散、异化、碎片化、非本真和空：这些是克拉考尔早期的时代诊断书中的主导概念。它们来自保守的文化批评的箱底，同时带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名的祛魅命题的烙印，这一命题使克拉考尔首先接受的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的阐释。

出于对同时代文化的这种不适，一方面，在他的早期随笔中，克拉考尔已经试图在他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宗教革新运动中完成自己的定位。尽管他确定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亏空，但是，对于他那个时代新的“宗教的人”（homines

[1]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格奥尔格·冯·卢卡奇的小说理论》（»Georg von Lukács' Romantheorie«, 1921），收录于《克拉考尔作品集》第五卷，《随笔、专栏、评论》（*Essays, Feuilletons, Rezensionen*），因卡·米尔德-巴赫选编，扎比内·比伯尔（Sabine Biebl）、安德里亚·埃尔维希（Andrea Erwig）、薇拉·巴赫曼（Vera Bachmann）、施特凡尼·曼斯克（Stephanie Manske）协助，苏尔坎普出版社，2011年，第五卷，第一册《随笔、专栏、评论 1906—1923》，第282页。

[2] 同上。

religiosi),^[1] 他往往毫不含糊地予以回绝, 天主教哲学家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犹太哲学家弗兰茨·罗森茨威格 (Franz Rosenzweig) 和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都可以说是他所遇到的新宗教人的形象。他回应他们, 缺陷在于糟糕的设计者, 而惦念超越 (Transzendenz) 的屋顶不会让屋顶得以重建。另一方面, 在他的著作《社会学作为科学》(Soziologie als Wissenschaft, 1922) 以及无数随笔和书评中, 克拉考尔一直与同时代的社会科学集中深入地交锋。他将后者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基础论题破译为疑难 (Aporie) 的症状, 这些疑难并没有借助于科学思考手段得以解除。因为它们锚定于这种思考自身的结构和运转之中, 同时反映了新时代合理性的抽象, 至于合理性的诉求和难题, 克拉考尔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发现了范式表述。

特奥多尔·W·阿多诺是《侦探小说》一书题献的对象, 他在回顾与克拉考尔的终生友谊时曾回忆起后者如何在第一

[1] 1921年12月31日克拉考尔致里奥·洛文塔尔 (Leo Löwenthal) 信, 引自《马尔巴赫杂志》(Marbacher Magazin) 1988年第47期《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1889—1966)》(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 因格里德·贝尔克、伊里娜·伦茨 (Irina Renz) 编写, 内卡河畔马尔巴赫: 德国席勒研究会 (Marbach am Neckar: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第36页。

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他打开了理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的通道：“在他的引导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部著作当作单纯的认识理论或是科学、有效之判断的条件来体会，而是将它理解为一种密码文字，从中将读出精神的历史状况。”^[1]以这样的眼光看，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变”简直就是一场“政变”(119)，这场政变试图强行同时徒劳地为在祛魅过程中自我和世界之间裂开的鸿沟搭建桥梁。由于理论性认识必须满足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求，克拉考尔认为，在隐身于宗教世界观之中的实质理性崩塌之后，这一要求只可能锚定于各种思维形式本身之中。在这个最外部的形式性的领域，人和世界经受了一场根本性的毁灭，这次毁灭没有消除它们的异化，而是将之写定。因为被还原为先验意识形式性的统一体，主体就僭取理论方式来统治经验世界。然而，主体为这一统治权付出的代价是，它所特有之历史的和物质的前提被抽象，它的经验能力的萎缩，以及，现实被彻底脱模为主体之抽象运行的被动材料。因而，当克拉考尔

[1] 特奥多尔·W·阿多诺，《古怪的现实主义者》(»Der wunderliche Realist«, 1964)。收录于阿多诺《文学笔记》(*Noten zur Literatur*)第三卷，苏尔坎普出版社，1965年，第83页以下。

在他早期的写作中设定如下要求：“将重点从假设的自我转移到所有人的自我，走出原子化的、非现实性的、无形态的人们的世界 [……] 来到现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活生生的事物和人，所以它渴望具体地被看见，”^[1] 他就不会孑然独立于时代。其实，转向事物、对具体化的需要以及现象学的思维饱和，这些正是二十世纪早期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哲学将“回到实事”（Zurück zu den Sachen，胡塞尔）的口号树为旗帜。

在《侦探小说》中，克拉考尔头一次在一个流行文化现象上追踪这个合理性的和学术批评的主导主题。在书中，他认为，解谜的过程和案件的查明成了“对以理性自治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审美譬喻”（204）。案件的侦破始于最少量的推定证据和点截性的事实，这些事实被除去了特定的如在（Sosein），又被夺走原初的关联。在被脱模为被动直观材料的事物之上，自治的思想得以演示它的自发性。“客体经受了一场根本性的毁灭”，理性由此“证明自己是立法者”（185）。偶然事件

[1] 克拉考尔，《等待的人们》（»Die Wartenden«, 1922），收录于《克拉考尔作品集》第五卷第一册，第393页。

(Zufall)，它原本就存在，唯独需要的是重构关联。因此，侦探小说的张力或许也并非源于“发生事件的强力”和面对罪行时的颤栗，而是“决定事实的因果链条未被识破”。(165)

不过，克拉考尔通过本书提出的主张不止于侦探故事和超验哲学之间的以上类比。构成其释义基础的“坐标系”受到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对唯心主义系统思维所进行的实存哲学批判的启发。在此，克拉考尔将克尔凯郭尔对实存的审美、伦理和宗教三阶段划分转译为一种进行了等级分层的“领域”空间模型。在这个拓扑学模型的内部，“现实性的实存着的人”(110)和被分派给他的“实存性的共同体”(112)一样，处于一种“居间状态”(111)，这一状态表现在对高等领域和低等领域、上界与下界、超越和内在、无条件和制约性之间悖论性张力的保持。在侦探小说这一媒介中，这种居间状态反映在一种“扭曲”(109)之中，克拉考尔希望通过“投射”的方法让“扭曲”得以读解。投射意味着将一个三维空间映射在一个二维平面上，反之则是将一个平面回渡到一个空间里，在此意义上，该方法先一步使用了“表面”(Oberfläche)这一思维格，不久之后，“表面”就将在克拉考尔对文化和社会的材料分析中获得中心性含义。“要确定一个时代在历史过程中占据的位置，”1927年

的一篇著名随笔《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的点题按语这样写道,“分析其不起眼的表面态度比一个时代自行做出的判断更加令人信服。”^[1]“表面”在此喻指飞逝的、未被留意的现象,这些现象从理论体系漏网,逃避概念性的归纳。同时,这个喻体批判性地、论战式地直指“深度”的观念以及有关内在灵魂深度和形而上意义深度的讨论,而这一讨论似乎被看顾在“本真性的行话”(阿多诺)^[2]里。

克拉考尔在《侦探小说》里勾勒的“否定性的寓意画”^[3]更接近这一讨论。这幅画基于一种“转译艺术”(110),这种艺术试图让发生侦探故事的“低等的”和“非本真的”领域一点一点地从实存性的和形而上的内容中透出来,这些内容又歪曲地呈现于转译艺术之中。于是,正如“全盘理性化的文明

[1] 克拉考尔,《大众装饰》(1927),收录于《克拉考尔作品集》第五卷第二册《随笔、专栏、评论 1924—1927》,第 612 页。

[2] 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1964)。

[3] 里奥·洛文塔尔,《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永恒的友谊——书信集(1921—1955)》(*Siegfried Kracauer: In steter Freundschaft. Briefwechsel 1921-1955*),彼得-埃尔温·延森(Peter-Erwin Jansen)、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选编,施普林格:楚·克拉姆朋出版社(Springer: zu Klampen),2003年,第 65 页(1924 年 11 月 24 日克拉考尔致洛文塔尔信)。

社会”在此显现为“高等领域地*共同体”(110)的对映形象(Gegenbild),克拉考尔将酒店大堂这一受到同时代侦探小说欢迎的场景阐释为教堂的对映形象,将聚集在大堂的公众阐释为宗教会众的变形画。警察、罪犯和侦探各方之间的关系也被破译为一副实体关系的变形画。当实存性的共同体由歧义的和成问题的“法则”(Gesetz)来确定,而此“法则”牵涉到一个“超法者”且容易为“那违法的”(112)所侵袭,那么,警察这一秩序力量就代表着“没有合法性的合法者”(175),是一条纯粹形式性的合法性原则,这一原则自设为绝对,并且正因如此而没有能力自证。在这个形式合法性的地带,“那违法的”失去了意义。它收缩为一个“点的事实”,其含义“仅限于其被承认的非法性”,同时,在此非法性中,“[丧失了]它的权利”(163)。“罪,于在上的领域地是一种存在规定,危险,象征性地由外迫入,神秘,自上介入:冲破暂时安全感的一切在低等区域统一被‘那非法的’化身取代。”(122)

带着以上对法则的难点以及法则(Gesetz)与法律(Recht)之关系的思考,克拉考尔加入了1920年代的讨论,瓦尔特·本

* “领域”与“领域地”二词之别,详见第25页。

雅明和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在这些讨论中的相关论述在当代则由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和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等作者持续推进。^[1] 然而, 站在克拉考尔灭点处的, 既不是在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中决定紧急状态的绝对的主权者 (der absolute Souverän), 也不是本雅明的“纯粹的暴力” (reine Gewalt), ^[2] 后者认为主权的确立和法律的消灭恰好在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同时发生, 站在克拉考尔灭点处的是一个受到限制并具有反讽意味的“主权”形象 (172): 侦探形象, 作为“理性的轻松的扮演者” (141), 他在警察和罪犯之间空的时空中登台演出。作为“还俗的神父”和像举行阴森“弥撒”一样侦办案件的“术士”, 他单方面地指明了他所化身的抽象的合理性所陷入的辩证论。在此意义上, 他占据着一个居中位

[1] 参见雅克·德里达,《法律的效力:“威权的神秘根据”》(*Gesetzeskraft. »Der mystische Grund der Autorität«*), 苏尔坎普出版社, 1991年; 吉奥乔·阿甘本,《牲人:主权利与赤裸生命》(*Homer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都灵:朱利欧·埃诺迪出版社 (Giulio Einaudi), 1995年。

[2] 瓦尔特·本雅明,《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 1921)。收录于《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特奥多尔·W·阿多诺与格尔斯霍姆·肖勒姆 (Gershom Scholem) 协助, 罗尔夫·蒂德曼 (Rolf Tiedemann)、赫尔曼·施韦彭霍伊泽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主编, 第二卷第一册, 苏尔坎普出版社, 1977年, 第179—203页。

置，面对“那合法的”和“那非法的”，他的态度基本是冷漠的，然而，他的性格里还存有发展和转变的潜能。当侦探以骗子、异教徒和密探的身份出场，他超越了道德的冷漠，从而作为“务实的社会批评家”与僵化的合法性原则作战，并“以其不合常规激怒败坏的社会”（177）。

此时，克拉考尔只差一小步就将观察到，“为了维护社会，犯罪事件[……]在探案知识方法座谈上被人们听到。与它们的不洁天性[……]相对应的是凝结在事实和行为中的不洁的缺陷。”^[1]《侦探小说》的研究延伸到了迈出这一步的门槛前，却并没有跨过去。本书是一份过渡时期的记录，在此时期，克拉考尔重新进行理论定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他早期写作中形而上学的、实存主义的和理性批判的主题转译成了带有唯物论印记的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

这次重新定位伴随着理论关注的一次并无先例的扩展而发生，这一扩展本身与克拉考尔独立于学术组织以及他的新闻工作密不可分。和他的朋友特奥多尔·W·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或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不同，克拉考尔既非以

[1] 克拉考尔，《哈姆雷特成侦探》（„Hamlet wird Detektiv“, 1926），收录于《克拉考尔作品集》第五卷，第二册，第361页。